

## 「拯救」被「遺忘」的人物

曹天忠，《教育與社會改造——雷沛鴻與  
近代廣西教育及社會》

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4。正文373頁（附徵引文獻）。

### 潘光哲\*

在十九、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長河裡，浪起潮落，曾經激起浪花的人物，不知凡幾。然而，可以成為歷史書寫的對象，進而在後人的歷史記憶裡留下一抹軌跡的弄潮兒，卻和他們的實際人數不成比例；蓋史學工作者的燈光總是聚焦於若干名家鉅子的思想行誼之上，本來是多彩繁富的歷史圖像，往往只會是幾抹線條的勾勒。當史學致知的疆界向外無限擴張漫延的此刻，挑戰既有的知識視野，並開展那些被「遺忘」的人物的「拯救」工程，正合時宜。正如著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 E. P. Thompson(1924-1993)以扮演「歷史的拯救者」(historian as the savior)自期，要為那些「歷史的受害者」說話發聲，<sup>1</sup>他

\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

<sup>1</sup> E. P. Thompson 嘗謂：「我要嘗試從後代的那種無比優越的態度裡，來拯救出那些可憐的長統襪編織工，搗毀機器運動的失敗者，『過時的』手搖紡織機工匠，『懷持烏托邦空想的』工匠，甚至於受騙上當的約拿·邵斯考特(Joanna Southcott)的跟隨者。……」見 E. P. Thompson, *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* (Harmondsworth: Penguin, 1968 [rev. edition]; Originally 1963), p. 12；關於 E. P. Thompson 之研究討論多矣，筆者捧讀受益最眾者，厥為以下集結相關（批判性的）文獻為一帙的專書：Harvey J. 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, eds., *E. P. Thompson: Critical Perspectives* (Cambridge: Policy Press, 1990)；另可參見 Bryan D. Palmer, *E. P. Thompson: 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* (London: Verso, 1994)、Gerard McCann, *Theory and*

的成果，更產生巨大的影響，提供了後繼者無盡的靈感。<sup>2</sup>就中國史的研究來說，這段歷史長河裡亟需史學工作者「拯救」的對象，固然可以和 E. P. Thompson 及其後進的努力方向合流並進，要幫助被壓迫／沉默的大眾發聲說話；卻也不要忘了，其實還是有不少雖不足以位居於鉅子之列，卻又堪稱社會菁英的人物，也同樣該被「拯救」，以在廣西推展教育而聞名的雷沛鴻(1888-1967)，便是這長串名單裡的成員之一。

當然，雷沛鴻即便不是名聞遐邇的人物，卻也不是那麼藉藉無名。就以當前來說，憑藉多重機緣，抖落歷史的塵埃，他在（廣西人的）歷史記憶裡開始「復活」。然而，如果憑藉既有的研究成果來認識他的生命史，恐怕會讓人失望之至。畢竟，史學工作者開展「拯救」工程的目的，如果（像某些雷沛鴻的研究成果那樣）只是替已逝者塗脂抹粉，而讓自己變成了「歌德派」（歌功頌德派）的門下弟子，那麼，這等「拯救」工程只是製造「迷思」(myth)的勞動而已。德國史家 Wolfgang J. Mommsen 說得好：道德承擔(moral commitment)與學術中立，就是評判史家技藝(craft)的重要判準（參見：Wolfgang J. Mommsen, "Moral Commitment and Scholarly Detachment: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Historian," in Joep Leerssen and Ann Rigney, eds., *Historians and Social Values* [Amsterdam: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, 2000], p. 45）。這樣看來，變成了「迷思製造者」的史學工作者，他所玷侮的，不僅是自己而已。

曹天忠的《教育與社會改造——雷沛鴻與近代廣西教育及社會》（以下簡稱本書），便是中國新世代的史學工作者，企圖要跳脫既有的認識／研究

---

*History: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E. P. Thompson* (Aldershot: Ashgate, 1997)，餘不詳舉。

<sup>2</sup> Bryan D. Palmer 提出了一段有趣的述說：只要是關心無產者與邊緣人的，一定會「再生產」E. P. Thompson 的「我要嘗試從後代的那種無比優越的態度裡，來拯救出……」這段陳述，見 Bryan D. Palmer, *E. P. Thompson: 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*, p. 88；至如受到 E. P. Thompson 影響的美國史家，則被描述成「湯普孫派」(the Thompsonians)，參見 P. Novick, *That Noble Dream: The "Objectivity Question"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8), ch. 13 (esp. pp. 440-442)；不少女性主義立場的史家努力揭示女性的從屬地位，亦可謂與 E. P. Thompson 的立場同流，參見 David Feldman, "Class," in Peter Burke, ed., *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p. 199。

格局，盡其所能地展現史家技藝，期可有助於我們理解／認識雷沛鴻的生命史的作品；他的貢獻所在，確可還雷沛鴻的本來面目於公眾之前。

本書作者既聲言要「加強雷氏教育思想的淵源、流變和發展的考察」（頁 25），復嘗批判道，利用諸如「源自西方『現代化理論』的外在觀念」而去「重新組裝」雷沛鴻的教育思想，恐怕是和「嚴格的歷史性」大相逕庭，是一種不可能揭示歷史本來面貌的研究路數；相對地，他主張「實實在在地根據雷氏本人固有的觀點，尤其結合時人的言論，發掘和揭示其教育思想中固有的從『傳統』到『現代』，從『洋』到『中』的主旨」（頁 192）。綜覽全書，作者意欲突破既有之認識／研究格局的企圖，確有精彩的呈現。

整體說來，本書作者能將他的研究對象的言論／思想「脈絡化」，尤其是詳盡疏理考察雷沛鴻的論說依據根源與前後流變，令讀者印象深刻。本書對於雷沛鴻在海外異鄉「游學工讀」的歷程裡，受到哪些西方學者的影響，頗有縝密的勾勒。例如，雷沛鴻如何透過翻譯戴雪(Albert Venn Dicey, 1835-1922)與龐德(Roscoe Pound, 1870-1964)的著述，擷其菁華，「以它們作為自己研究教育與社會的方法論基礎」而創論立說（頁 35-48）；雷沛鴻在美國哈佛大學時嘗受業於拉斯基(Harold Joseph Laski, 1893-1950)，那麼，兩者的思想與言論方面又表現出怎樣的「師承關係」（頁 60-64）；至於蒲徠士(1st Viscount Bryce James Bryce, 1838-1922)的名著 *Modern Democracies* 裡關於教育和民主政治之關係的思考論說，以及杜威(John Dewey, 1859-1952)的教育觀點，又如何分別成為雷沛鴻立說創制的根據（頁 64-75）；丹麥的格龍維(N. F. S. Grandtvig, 1783-1872)對於雷沛鴻推廣成人教育的影響（頁 109、頁 163-164），本書都能窮本追源，就各家的原著和雷沛鴻的各種言論，相互比對，揭其玄妙。

本書的「脈絡化」功夫，在史實重建的層次，也有精彩的展現。本書指出，雷沛鴻於 1933 年 9 月第三次就任廣西教育廳廳長後，對於廣西教育創制立法的貢獻，不是憑空說法，而是對其前任李任仁之政策的「傳承與創新」，

作者並以列表比較的方式展其同異（頁 167-170）；本書又指陳，雷沛鴻在 1936 年創制「廣西國民中學」之後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，作者分列為「代替派」、「取消派」與「改進派」三大陣營，整理各方議論，並注意到 CC 系與新桂系這些政治勢力之角力與鬥爭，以及如何介入這場論爭裡的樣態（頁 291-309）。凡此，實可謂突破既有論著語焉不詳的缺陷。

本書的具體貢獻，更表現在史料的挖掘與開發上，他對於雷沛鴻的生命史得以進行如 Clifford Geertz 所謂的「濃描細寫」(thick description)，實立基於此。雷沛鴻已有文集行世，提供了不少研究上的便利。然而，作者不以此為足，儼然更遵奉傅斯年的名言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，做為重建雷沛鴻的生命史的實踐原則，成果亦堪稱豐碩。

本書發掘了不少雷沛鴻的佚文。如雷沛鴻對於「成人教育」的思考，是作者翻檢《教育雜誌》而得到的成果（頁 114-115）；中國社會教育社於 1932 年成立，在國難當頭之際，第一屆年會上提出的方案，後經教育部以〈社會教育機關實施救國社會方案〉為題，「通令各省市教育廳局轉飭遵行」，這分方案也是雷沛鴻的傑作（頁 139-140）；當雷沛鴻於 1933 年 9 月第三次就任廣西教育廳長，起草〈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五年計劃大綱〉等案，以為開展工作之方針，本書作者則從廣西檔案館裡找到了這分文件（頁 172-175），他也從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裡尋覓出〈廣西省實施國民教育第二期工作概況〉（頁 188 註②）、〈廣西省義務教育視察報告〉（頁 189 註③）等等文獻。本書還順帶糾正了現存雷沛鴻各種文集裡的誤失，如雷沛鴻的〈民族的概念分析〉既是未收入《雷沛鴻文集》的佚文，然收錄在《雷沛鴻教育論著選》之際，則「題目刊行時間號數皆誤」（頁 123 註②）。這些文獻的發掘，顯然讓我們對雷沛鴻的思想樣態，有更全面的認識。

因此，本書對於我們理解／認識雷沛鴻的生命史，確實有所突破。被公眾「遺忘」了的雷沛鴻，經過本書開展的「拯救」工程，做為教育家與社會改造者的雷沛鴻，其本來面目，應可大白於天下。

不過，本書固然立足於詳密的史料基礎之上，細膩描摹雷沛鴻的生命史，卻正因為史源文獻繁瑣，涉及人事既多且雜，步步陷阱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鬧出笑話。

本書固已注意到雷沛鴻的大量著述未編入現有相關文集的情況，其自身徵引，卻仍不免誤失。如雷沛鴻在 1927 年提出的〈請確定黨化教育為廣西全省教育方針草案〉，本書指出此文亦未收入《雷沛鴻文集》，在徵引時，卻給出了兩個出處，一是依據《廣西教育公報》（頁 82），另一處則是依據李彥福等人編著的《廣西教育史料》（頁 92），莫衷一是。本書在引述胡適對於廣西教育之觀感時，引用了胡適的〈廣西的教育與武化精神〉一文，並註明出處是龔家瑋主編的《廣西教育之觀感》（頁 9），然遍查胡適著作，並未得見其有此一作（參照：《胡適著譯繫年》，收入季羨林主編，《胡適全集》，冊 43-44〔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〕）；惟於胡適的《南遊雜憶》裡，才有他對廣西教育的印象與「武化的精神」的述說（參見：胡適，〈南遊雜憶（四）〉，《獨立評論》，號 164〔1935 年 8 月 18 日〕，頁 10-17）。筆者揣測，胡適的這篇文章，可能在龔家瑋編輯收錄成書時被改了標題。本書又謂，雷沛鴻與胡適之間對於國民基礎教育「學問與勞動合作方法」有所論爭，註明出自雷堅的《雷沛鴻傳》，又謂陶行知將雙方的文章〈國民基礎教育的基本概念〉收入《普及教育續編》（頁 208）。筆者未見雷堅《雷沛鴻傳》與《普及教育續編》，無可覆按；然遍查胡適著作，亦未得見其有此作。如果本書作者可以覆按胡適的著作，應可使其論說更臻精緻（同時，或也可為胡適是否仍有這些佚文作品，提示研究者注意）。此外，書末如能編附一篇雷沛鴻年表，將使讀者更能掌握他的生命歷程，必有提綱挈領之益。

本書將他的研究對象「脈絡化」，開展研討的功夫，自有可佩之處；遺憾的是，這樣「以小見大」的取向，亦難免予讀者「見樹不見林」之失。例如，本書對於民國時期甚囂塵上的「鄉村建設運動」的對比考察，即稍嫌薄弱（頁 363-365）；身為拉斯基的學生，雷沛鴻的思想與言論當然受其影響，

然而，曾受拉斯基之師教的民國知識人，不知凡幾，諸如王造時(1902-1971)等，均列其門牆，<sup>3</sup>如可將雷沛鴻與彼等和拉斯基的「師承關係」之同異，開展分疏，所得必更為豐碩。

像雷沛鴻這等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舞台上走過一遭的人物，屈指難數；他們刻鏤的軌跡，自是多彩繁富。如何詳細述說他們生命旅程與思維樣態的全景，從而讓我們對這幅歷史圖像的認知，愈發多彩多姿，仍然有待史學工作者奮力前進；本書雖有若干誤失，論述亦有可再深化之處，但無疑是我們繼續開展「拯救工程」時，值得重視與參考的作品。

---

<sup>3</sup> 許紀霖指出，拉斯基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關係，「仍是思想史研究的空白」，參見許紀霖，〈尋求自由與公道的社會秩序——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（1915-1947年）〉，收入瞿海源（等主編），《自由主義發展及問題——殷海光基金會自由平等正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①》（台北：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2），頁55-56；至於探討拉斯基與中國現代知識界的關係，可參見孫宏雲，〈民國知識界對拉斯基思想學說的評介〉，《中山大學學報論叢》，2000年第3期、孫宏雲，〈拉斯基與中國：關於拉斯基和他的中國學生的初步研究〉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，2000年第5期。